话本小说体制辨析

黎藜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话本体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和作家创作主旨的变化而衍变。宋元话本体制简略,仅具雏形。 《三言》建立了较完整的话本体制,头回成为重要体制,入话亦成为一独立部分。《型世言》以教化为主题,入话成为宣扬教化的主要部分,头回则与入话融为一体且萎缩为教化的论据。话本小说体制的变化直接体现着作者主旨的衍变,当教化成为作品主题,故事则退居其后,沦为教化的工具。

关键词:话本体制;宋元话本;教化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3-0079-04

宋代,伴随着说话艺术的繁荣产生了一种新的小说样式——话本。宋元话本为明清两代的拟话本创作奠定了基础,带来了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关于话本小说的体制,学者众说纷纭。实际上,话本小说体制并非一层不变,而是随着时代更迭变化。影响话本小说体制的因素有二:其一,创作日趋成熟,体制亦渐趋完备;其二,作家创作主旨的演变。前者,毋庸赘言。而后者——作家创作主旨的变化,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影响则是深远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特定的文学样式反映着特定时代的社会价值和精神风貌,作者本人的创作观也对话本小说体制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话本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形式。这一形式包括三个重要部分:即正话,及以此为中心的前后两个部分。如何对正话之外的部分进行体制区分(由于大多数话本小说的篇尾部分主要是诗词,格式较为固定,故研究者对这一部分争议较少,争论主要围绕着正话之前的部分展开),前辈学者们提

出了不同见解。

对于话本小说的体制,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话本正话之前应该只有一个部分,即入话。郑振铎认为篇首闲话、诗词、故事都是入话的不同形式而已^[1]。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2],袁健《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叙事体制之比较》都赞同此观点。同时,袁健对话本的结尾部分提出了疑义,他认为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的结尾部分并不相同,前者以诗词煞尾,后者则以评述结尾^[3]。石昌渝基本赞同郑振铎的观点,但认为得胜头回是入话而入话却不完全是得胜头回。他同时指出,入话与正话的关系随着作品时代的演进而渐趋密切,入话逐渐成为正话主题的提示、阐释和发挥,加强正话劝善讽俗的效果,从而成为话本小说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4]。

第二种观点认为,话本小说正话之前应分两个部分,即入话和头回。鲁迅首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此观点,认为入话乃篇首诗词,而"故实"则是"得胜头回"^[5]。程毅中从分析宋元话本的实际出发得出了与鲁迅基本相同的观点^[6]。欧阳代发沿袭此观点,但他指出,入话内涵当更广阔,包括

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简介:黎藜(1976—),女,汉族,四川双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级博士生。

篇首诗词和对所引诗词的解释两个部分[7]。

第三种观点认为,正话之前应分三个部分:篇首、入话和头回。胡士莹将前一种观点中的入话分解为篇首和入话两个部分,前者是话本开头的诗词,而后者则解释诗词以引入正话。入话在话本中的作用是承上启下,在说话表演中也起着肃静观众、启发和聚集听众的作用。他认为,《六十家小说》现存的29篇都应有入话,由于编撰者的主观因素而删去了这一部分,仅仅在篇首标明"入话"二字^[8]。张兵的分类中也有篇首与入话两类,但他认为入话与篇首诗词有联系但在体制上相对独立^[9]。陈大康对入话的释义与胡士莹略有不同,他认为入话不仅包括释义诗词,还包括引入正话的议论和背景叙述^[10]。

上述三种观点之外,石麟提出了广义入话与狭义入话的概念。广义入话论与郑振铎诸君见解并无二般,狭义入话论则将诗词与其后的解释性文字看成一整体,认为这些解释性文字的作用在于稳住听众,长短视现场情形而定^[11]。

前贤众说纷纭,让我们回到话本中去了解创作的实际,以期对话本小说的体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话本小说的初创期,即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 体制尚未完备,作者对话本形式的认识还比较模糊。

现存宋元话本多是明清人辑刊而成,这给考察宋元旧话原貌带来了极大困难。虽然《三言》中有许多改编自宋元旧话的作品,但冯梦龙对小说体制进行了较大改动,相形之下《清平山堂话本》与《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更接近宋元话本原貌。因此本文讨论的宋元话本仅限于《清平山堂话本》[12]、《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13],而将《三言》中经过作者改造的宋元话本与其他明代作品一同讨论。

《清平山堂话本》现存 29 篇中共有早期白话短篇 26 篇,除去残缺不全的 6 篇,其余 20 篇中篇首及篇尾诗词具全的共 14 篇,有头回的 4 篇。《熊龙峰刊小说四种》有篇首及篇尾诗词者三篇,有头回者 1 篇。两种小说刊本中多数作品篇首及篇尾诗词皆全,表明这两个部分是小说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头回分别只有 4 篇和 1 篇,这表明头回并非不可或缺。《六十家小说》中 22 篇首标有"入话",《熊龙峰刊小说四种》则 4 篇首皆标"入话"。胡士莹认为两部小

说所有作品"原来都有人话,"但因编撰者的主观因素而删去了,这些人话"凭借和正话有着某一点联系,因而导入本事,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8]138。但实际上,《清平山堂话本》与《熊龙峰刊小说四种》的人话绝大多数仅仅限于解释诗词、串连文句,并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部分。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人话仅一句"这首诗是柳耆卿题美人诗"[12]1;《西湖三塔记》中入话虽有多句如"此诗乃苏子瞻所作"[12]25,"说不尽西湖好处,吟有一词云"[12]25,"这几处虽然是真山真水,怎比西湖好处"[12]26等等,也都是串连诗词的过渡性语句。因此,宋元话本中的人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部分与篇首、头回等量齐观,它与作品的关系也并不密切。

从舞台艺术走向案头文学,宋元话本的创作还处于初期,仅仅完成了小说文本形式的转化,作家主体意识与小说文本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小说形式更接近对说话艺术的直接再现与模仿。小说正话之前的部分,其作用是为了静场,吸引听众。或许,对这部分的使用,说书艺人要根据现场情形而定:如现场情况良好,听众很快安静下来听书,艺人开场诗后即进入正话;如现场嘈杂,则往往再讲一则小故事以静场并等待迟来的听众。因此,作为开场诗的篇首诗词是话本的重要形式,而头回的存在与否是随机的,它在话本小说中并不占重要位置,而仅仅起着串连诗词作用的人话不过是篇首部分的一个搭子,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部分。

 \equiv

明代,文人积极介入话本小说创作,拟话本大量涌现,话本逐渐走向成熟。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小说对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的影响已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礼部志稿》记载:"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诵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14]卷四十五。此说或有夸大之嫌,却道出了小说戏曲这类通俗文艺对平民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士子意识到艳情小说、戏曲对世风的不良影响,并认识到这类通俗文艺的巨大作用,因而希望借此挽救颓靡风

气。冯梦龙言小说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5]647,因此创作《三言》以实践其以通俗文学教化世人的目的。

从《三言》开始,文人开始真正有意识地进行话本创作:在内容上,吸纳宋元旧话并对之进行丰满,同时注意吸取、改编其它题材故事;在形式上,对小说体制进行改革完善。

《三言》中,头回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头回不 再是正话的一点搭头,它已成为作家用来表现主题 的重要手段"[16]。在内容的某一类似点上,头回成 为烘托正话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与案头文学的逐渐 成熟密不可分。如果说宋元话本更接近于说话,那 么《三言》则是话本案头化的重要标志。较为固定 的体制形式无疑对形成话本独特的特征有重要作 用。在宋元话本那里,头回还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但 《三言》则已将头回变成表现主题、形成完整体制的 重要部分。事实上,《三言》中的众多头回也是取自 旧话、旧小说、历史等,许多故事均可独立成篇且形 神皆备。取自宋元旧话且原即有头回的作品,如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古今小说》卷二十三)、《蒋 淑珍刎颈鸳鸯会》(《警世通言》卷三十八),正话、头 回均较原话生色。《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头回"鸳鸯 灯"更大为敷衍,总计1049字,占全文篇幅近20%, 故事曲折离奇,与正话不分伯仲。取自旧笔记、小说 者,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古今小说》卷二)、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等头回也颇 具神采。这些头回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增添了小 说的艺术感。

《三言》体制中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人话的逐渐独立。冯梦龙创作小说为"醒世"、"喻世"、"警世",这一主题思想贯穿着小说创作始终,《三言》中许多故事即为孝悌、贞节、忠信等教化题材。话本作者面对的大多是粗通文墨的中下层百姓,太过深奥晦涩的主题于他们如同对牛弹琴。作者唯恐这些教化的意图不能为读者理解,往往现身说法,直陈意旨。因此,人话就成为作者发表议论的最佳形式。这是《三言》为代表的明清拟话本与宋元话本人话最大的区别。例如《腾大尹鬼断家私》,话本乃公案故事,作者却将其与孝悌扯在一起,在篇首与正话之间插入一大段议论陈说"孝悌"。当然,《三言》中如上所述大段宣扬教化的作品比例还很小,作者的叙

述中心在故事而非教化。

《二拍》将《三言》创制的体制进一步加强、完善。《二拍》绝大多数作品都有入话与头回。与此同时,二拍中议论成分逐渐增加,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式:"议论——故事——议论——故事"或"故事——议论——故事"。

随着数量的增长,话本小说的体制日益完备,同时也在创作实践中发生着变化。

《型世言》较《二拍》略晚,但却突破了《二拍》 中较为固定的体制。《型世言》创作目的在于"以为 世型"[18]21,较之《三言》、《二拍》教化功能大大增 强,体制上也发生变化。《三言》、《二拍》虽也标举 教化旗帜,但主题与故事有时并不相符,作者关注的 中心是故事。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 卷一),入话劝人勿贪酒色,但对贪色失贞的王三 巧,却原谅其过失,让其夫妇重聚。《拍案惊奇》中 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姚滴 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等,关注的中心则是 故事的离奇新颖。《型世言》则完全不同,每一回均 有一个明确的教化主题,故事围绕这一特定主题展 开,主题超越故事成为作者关注的中心。《型世言》 的评点形式也体现着教化的主旨。书每回回前有 序,回后有评,序评皆围绕本回主题进行评述,这些 评论与入话、正话共同构成阐释教化的有机整体。 这样的创作主旨必然引起体制的巨大变化。直接陈 述作者意旨的入话地位一跃而升,所占篇幅急剧增 加,头回则萎缩为故事梗概,许多作品的头回往往与 入话合为一体,成为说教的论据。如第七回入话论 女人祸水,举前代祸国女子七人为例,而未展开一个 故事;十五回论义仆,连举两例,均极简。

如果说《三言》、《二拍》还沿袭着宋元话本讲故事的传统,那么《型世言》则第一次按照作者主观意旨构建小说:以特定主题为中心构建小说,"在思想上确立了拟话本小说全面教化的典范"[17]。《型世言》之后,拟话本小说踵武其后,以教化为小说。《醉醒石》、《八洞天》、《五色石》等创作于清初的拟话本均带着强烈的说教主题展开故事叙述。《五色石》作者笔炼阁主人叙其为文意旨是补天道之阙,"天象之阙不必补,天道之阙则深有待于补"[19]212。《醉醒石》较之《型世言》更甚,除入话外,每回末也有一段评论阐释教化伦理,甚而至于正话行文中也打断情节进行议论。此类小说已可称得上是"道学

小说",教化为主,故事次之,板起面孔训人,作品艺术生命日益枯萎。

综上,通过前文对话本小说体制衍变的追索,我们发现话本体制的变化是话本小说文人化的必然趋势。文人介入小说创作,一个重要目的即借小说"惩戒劝化"。小说对市民尤其是中下层市民的强大影响让文人不再忽视这一末技,不论是禁止传播

小说戏曲的三令五申还是文人参与创作的热情,都体现出社会对小说的重视。"文以载道"本是诗文的责任,但社会对小说的重视,使得本处于文学边缘的小说也承担起"载道"的任务,并成为劝诫教化的主力。以教化为小说主题、以小说为教化本事的创作宗旨让话本小说越来越偏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学土壤,"五伦全备"而艺术尽丧。

参考文献:

- [1] 郑振铎. 中国文学论集・明清二代的平话集[M]. 香港:港青出版社,1979.
- [2]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小说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3] 袁健. 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叙事体制之比较[J]. 明清小说研究,1986,(4):495-508.
- [4]石昌渝. 中国小说源流[M]. 北京:三联书店,1994.
- [5]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6]程毅中. 宋元话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欧阳代发. 话本小说史[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 [8]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张兵. 宋辽金元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0]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11]石麟. 话本小说通论[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 [12]洪楩辑. 清平山堂话本[M]. 石昌渝校点. 中国话本大系[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13]熊龙峰刊行. 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M]. 石昌渝校点. 中国话本大系[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 [14]俞汝楫.礼部志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5] 冯梦龙. 叙[A]. 古今小说[M]. 魏同贤校点. 中国话本大系[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16] 傅承洲. 文人创作与明代话本的文人化[J]. 求是学刊,2001,(5):80-86.
- [17] 胡莲玉. 话本小说结构体制演进之考察[J]. 江海学刊,2004,(6):146-152.
- [18]陆人龙. 型世言[M]. 陈庆浩校点. 中国话本大系[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19] 笔炼阁主人, 序[A]. 五色石[M]. 萧欣桥校点, 中国话本大系[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唐 普]